

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

[日]守屋美都雄 著 钱杭 杨晓芬 译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日]守屋美都雄著 钱杭 杨晓芬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日)守屋美都雄著;钱杭,
杨晓芬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ISBN 978-7-5325-5458-4

I. 中... II. ①守...②钱...③杨... III. ①中国—古代史—
研究②家族—研究—中国—古代 IV. K220.7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9260号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

[日]守屋美都雄 著

钱 杭 杨晓芬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2 插页 5 字数 445,000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

ISBN 978-7-5325-5458-4

K·1246 定价:90.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总序

谷川道雄

2004年10月下旬我首次访问上海古籍出版社时,有幸会晤了王兴康社长、赵昌平总编、蒋维崧编审以及其他诸位先生。当时我是应华东师范大学牟发松教授的邀请,在该校逗留两周并进行授课和演讲的。因为那时正值拙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的中译本(李济沧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才有了拜访该出版社的机缘。“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这一颇具规模的出版计划,正是由于那天的会谈而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我是在那年7月从承担拙著编审的蒋维崧先生的信中得知这一出版计划的。信中提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以拙著的出版为契机,进一步拓展范围,更广泛地向中国学界介绍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成果,并希望我推荐一批能够代表日本研究水准的著作,尤其是能够选择那些在开阔视野下关注社会与人文,或运用新的方法和理论并在实证研究中取得成果的著作。在10月的会谈中,出版社又出于同样的旨趣,要求我予以全面的合作。

想来这的确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计划。有关中国史研究的中日两国学界交流,已经有着长久的历史,而且正呈现出日益兴旺的趋势。交流不仅限于人员的交往,还以相互之间论文、著作翻译的形式对双方发生着影响。但是,这还只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已,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即便那些在日本学界具有长久影响力的名著,几乎都没有中译本的出版。所以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这一计划,不能不说是打破现状、开创新局面的创举。就我个人而言,拙著中译本的刊行能够成为促成这一趋势的契机,更是倍感欣悦。出于如此的考虑,我也就不揣自陋地应允出版社,愿竭尽全

力协助此项计划的实施。

回到日本以后,我立即着手选定书目,其间还听取了我的同行、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森正夫先生的意见,最终向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交了我的选目方案。经与出版社协商,决定首批出版十种左右。

非常巧的是,这里所选的学术著作,正好反映了近代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按照我个人的看法,这一过程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1868—1912)初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近代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形成期。当时,虽然兰克(L. Ranke)的弟子李司(L. Riess)受聘于东京大学讲授历史学,传授实证主义方法,但那毕竟是以欧洲史为基础的史学。在日本学者之中当时出现了与欧洲史亦即西洋史相对应,设立东洋史(即亚州史)分野的举措,由此形成了以中国史为中心的东洋史,并且延续至今。这一情况一方面表明由于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出现了必须重新认识东亚各国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日本汉学素养的基础之上,已经出现了将中国作为近代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学问。最能够代表这一时期中国史研究,而且影响至今的学者,即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1866—1934)。他所主张的“唐宋变革”论,在这一阶段正在孕育成形。众所周知,他的这一观点是切合中国社会实态的,是对中国史发展所进行的逻辑性解释。作为本丛书之一的《中国史学史》,就是出自他对中国传统学问的广博知识以及对历史发展透彻逻辑分析的力著。

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第二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即所谓的“战间期”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有着密切注重社会与民众的特点,中国史研究亦不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及全世界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潮流,也影响着日本的历史学界,作为具体的表现则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盛。而且,其中有着马克思主义直接、间接的影响是不可否定的。在我的先师、前辈的学者之中,有许多就是在这一时代新史学潮流中奠定了自身研究基础的,本丛书的大部分作者都是属于这一辈的人物。

然而,作为上述新倾向顶点的20世纪30年代,又正是军国主义猖獗的时期。当时,不但不再可能进行自由的研究,军国主义国家还以各种形

式要求中国史研究者为战争提供合作。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那一严冬似的时代终告完结。由此也开始了中国史研究的第三阶段。

“二战”以后的日本中国史研究课题,是如何将中国史作为发展的中国史进行重建的问题。即必须纠正被军国主义歪曲了的中国史观,按照世界史普遍逻辑对中国史作出理解。当时对此起到重大作用的,是从战时思想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按照生产方式发展规律将中国史系统化的尝试亦由此开始。为此日本学界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参加讨论的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以生产方式为依据的唯物史观的发展规律是否适用于中国史的问题;另一个焦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构想的中国史时代分期观点是否正确的问题。围绕这两个问题,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有着长期、激烈的讨论,而且主要都是基于史料的实证观点之间的相互争论。其中虽说也有不够成熟的地方,但是毕竟应该说战后的中国史研究在当时有着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

参加讨论的既有在上述第二阶段业有成绩的学者,也有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研究者。本丛书著者中,除了内藤湖南之外,都是为战后中国史研究做出了贡献的人物。

我在选择这套丛书的收录著作时,并没有意识到上述的历史过程。然而,卓越的作品必定会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时代的代表性,所以很难说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现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与战后那二十几年相比已经有了相当的变化。尽管如此,这些先学的著作在今天仍然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从而不断启发着后生学者。

作为日本人,中国史既是一种外国史,又不是单纯的外国史。两千年来,熏染了日本文化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过去的日本在向中国的不断学习之中发展着自己,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可以说也是由过去形成了结构,至今仍在其延长线上运行的。因此,我们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有着特别的亲近感,即尽管是外国史,但又有一半好像是在研究自己国家历史的感觉,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看待中国史的。其理由之一,也许就在于日本文化是在汉字文化

圈中培育成长形成的吧。无论如何,当这种感情作为近代历史学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方法和实证的结果,而将中国史总体按照世界史的普遍观点予以体系化是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终极目标。

总之,也许可以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是由传统与近代、日本与中国乃至世界这样综合的视野重合展开形成的。当然,这种特点亦有其利弊两端。不过,本丛书所收著作都是肩负重任、不倦攀登的卓越成果。我坚信本丛书对今后日本中国史研究之国际交流的发展必将有着巨大的贡献,并对将此计划付诸实现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马彪译)

本书凡例

一、本书收录了已故守屋美都雄博士晚年所撰论文中的主要作品，同时也涉及一部分早年代表作。

二、本书未收录已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作品。

三、篇目及各章的位序由编者酌定。

四、编辑的基本方针是尊重已刊论文的原貌，凡有守屋博士对抽印本所作之订正，都据以改定原文。编者在编辑本书各章时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明显的错字、误植则直接改正。

五、关于日语的新、旧假名问题。（略）

六、“编者按”及“补注”为编者所加。

昭和四十三年七月

编者

目 录

国家篇

第一章 从汉代爵制源流角度所见之商鞅爵制研究·····	3
第一节 序言·····	3
第二节 《商君书·境内篇》的资料价值·····	7
第三节 《商君书·境内篇》解读·····	12
第四节 商鞅爵制的内容·····	27
第五节 商鞅爵制的专题史考察·····	45
第六节 结语·····	49
第二章 关于阡陌制度的各种研究·····	52
第一节 序言·····	52
第二节 介绍与评论·····	53
第三节 结语·····	62
第三章 对“开阡陌”的一种解释·····	64
第一节 序言·····	64
第二节 “阡陌”的字义·····	65
第三节 “开阡陌”的历史背景·····	67
第四节 商鞅的县制与开阡陌·····	71
第五节 商鞅的赋与“开阡陌”·····	76
第六节 结语·····	80
第四章 关于秦国军功褒赏制中对人的支配问题·····	82
第一节 序言·····	82
第二节 《荀子·议兵篇》中“功赏相长也”的含义·····	85
第三节 关于《荀子·议兵篇》中“隶五家”的实际状况·····	90

第四节 结语	100
第五章 关于汉高祖集团的性质	103
第一节 序言	103
第二节 关于高祖的同族结合	104
第三节 中涓、舍人、卒的再研究	107
第四节 主客结合形式的动态考察	121
第五节 结语	137
第六章 父老	142
第一节 序言	142
第二节 刘邦与父老的接触	143
第三节 何为“父老”?	145
第四节 刘邦、父老结合的历史意义	152
第五节 汉代国家与父老	154
第六节 结语	157
第七章 关于曹魏爵制若干问题的考察	160
第一节 序言	160
第二节 曹魏爵制的系列及其形成过程	161
第三节 与曹魏列侯、关内侯封邑相关的几个问题	172
第四节 关于曹魏爵制的特征性事实	179
第五节 结语	188
第八章 社的研究	191
第一节 序言	191
第二节 有关社的诸学说与学说评论	191
第三节 文献中所见社的性质与功能	201
第四节 社的各种形态	211
第五节 社的起源	216
第六节 社与封建	220
第七节 结语	224

家族篇

第一章 关于汉代家族形态的考察·····	229
第一节 序言 ·····	229
第二节 战国时代的家族 ·····	231
第三节 对汉代家族三族制说的评论 ·····	234
第四节 与汉代家族形态有关的几个问题 ·····	248
第五节 结语 ·····	268
第二章 关于汉代家族形态的再考察·····	272
第一节 序言 ·····	272
第二节 关于《孟子》中“家”的问题·····	273
第三节 关于汉代家族观的两个问题 ·····	281
第四节 结语——关于家族研究的反思 ·····	284
第三章 汉代的家族——其学说史展望·····	289
第一节 序言 ·····	289
第二节 战前汉代家族研究的发展 ·····	289
第三节 最近汉代家族研究的焦点 ·····	298
第四节 如何推动汉代家族研究的进展 ·····	308
第四章 南人与北人·····	316
第一节 序言 ·····	316
第二节 侨姓与吴姓 ·····	317
第三节 南人与北人 ·····	331
第四节 结语 ·····	345
第五章 关于六朝时代的家训·····	347
第一节 序言 ·····	347
第二节 汉代的家训 ·····	349
第三节 魏晋时代的家训 ·····	353
第四节 南北朝时代的家训 ·····	360
第五节 结语 ·····	368
第六章 论《颜氏家训》 ·····	375

第一节 序言	376
第二节 颜氏的世系与家风	377
第三节 颜之推的生平	382
第四节 专题史研究	389

附 篇

第一章 中国古代法形成过程中的若干问题——以春秋时代为中心	401
第一节 据《汉书·刑法志》提出的问题	401
第二节 春秋时代法制史上的各种问题	403
第三节 结语	413
第二章 关于李悝《法经》的一个问题	414
第一节 序言	414
第二节 鲍格洛之说	416
第三节 对鲍格洛说的批判	425
第四节 结语	440
第三章 桓谭的生卒年代	442
第一节 序言	442
第二节 鲍格洛之说	443
第三节 姜亮夫之说	445
第四节 笔者的看法	448
第五节 结语	452
第四章 论“晋故事”	453
第一节 序言	453
第二节 贾充的晋故事	454
第三节 贾充之后的晋故事	458
第四节 结语	460
第五章 近年来汉唐法制史的研究历程	462
第一节 序言	462

第二节 关于汉代法制史研究的进展	463
第三节 六朝法制史研究概说	470
第四节 以律令格式及法律文书为中心的唐代法制史研究之略见	477
第五节 结语	493
后记	495

国 家 编

第一章 从汉代爵制源流角度 所见之商鞅爵制研究

第一节 序 言

关于汉代的爵制,镰田重雄、栗原朋信两位先生早就发表了出色的研究成果,^①并十分明确地勾画出了汉代爵制的轮廓。然而,即便如此,关于汉代爵制的研究,显然还留下了尚未明了的问题。例如,笔者对汉代的爵制便持有下列疑问。

第一,据《孟子·万章下》记载,周代有天子、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同书的《告子上》写道:“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据此可知,卿大夫(或许还有士)也被看成是爵。所谓的五等爵制是否真以孟子所说的形态存在过还是疑问,^②但不管怎样,爵确实以某种形态存在着,它表示了西周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秩序,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对此,《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列举的二十级爵(据说都承袭了秦爵)与周爵之间,或许会存在着某些类似或差异之处。

第二,据说汉代爵中某等级以上的人可享受复除的恩典,并且有爵者

① 镰田重雄:《西汉爵制》,《史潮》8—1,1938年(《汉代史研究》所收)。栗原朋信:《两汉時代の官民爵について》,《史观》第22、23册,第26、27册。

② 关于五等爵的疑问,可参见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史学年报》第2卷第2期,1935年;郭沫若《金文所无考》,《金文丛考》所收;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中华书局,1987年。贝塚茂树:《五等爵制の成立》(《中国古代史学の発展》所收),对前人学说也有详细介绍。

一般可获得罪刑减免。^①然而,这种给与恩典的做法是否真是授予爵位的真正目的?如果真是那样,那么对于下级爵位的保持者,而且没有犯罪的人来说,也就没有特别的恩典,这样做是否合理?

第三,汉代颁赐爵位,特别是对于列侯、关内侯之外的爵来说,比较常见的是在天子即位、册立太子、以及谷米入仓时进行,但是否可将这些情形看作是赐封爵位的最初案例?

第四,在汉爵中,似乎有官爵和民爵的区别,至第八爵公乘为止的爵位,连普通民众也可以得到,但从第九爵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所赐予的就只有官人一类了。^②这种官、民爵位的区别是怎样发生的?

第五,在汉爵中,列侯和关内侯以外的爵不能享受食邑,^③在其他任何形式上,也没有附带土地赐封的痕迹。对周代的爵而言,诸侯拥有封国,卿大夫、士有作为食禄供给源的采地,可是出现了在汉爵中所看到的那些无邑无采地的爵,这一变化是何时、依据何种情况发生的?

毫无疑问,为了解开这些疑问,研究者必须尝试着走出汉朝这一时代范围,并且要加强对构成汉爵源流的秦爵的讨论力度。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将追溯至形成秦代各项制度体系的商鞅时代来考证爵制问题,上述种种疑问估计也能因此而得到某种程度的解答。因此,笔者在本章中要追寻汉爵的源流,尝试说明商鞅爵制的全貌。

昭和二十六年(1951),平中苓次先生发表了名为《对秦代土地制度的一项考察——论“名田宅”》^④^{补注①}一文。虽然如标题所示,这是一篇旨

① 因爵可得复除和减罪等恩典,详见镰田氏的《西汉爵制》。

② 《续汉书·百官志》引刘劭论爵制:“吏民爵,不得过公乘者,得贯与子若同产。然则公乘者,军吏之爵最高者也,虽非临战,得公卒车,故曰公乘也。”刘攽认为:“与民爵过公乘,则赐吏爵,自五大夫而上也。”(引自《汉书·宣帝纪》元康元年补注)据此看来,民爵似乎以公乘为最高爵,但没有明确说明这是不是汉初以来的通制。如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晁错在给文帝的上奏中说“令民入粟至五大夫,乃复一人耳”,文帝“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等,由此可以断定,西汉初期,平民中存在公乘以上爵位者。但是,由于居延汉简名籍类文献称民爵中最高的级别是公乘,因此或许在稍后的西汉中期以后,如刘劭爵制所说,就对民爵制定了最高界限。尽管如此,民爵、官爵的界线来自何处,仍是一个问题。

③ 《续汉书·百官志》“列侯”条本注:“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关内侯”条:“无土,寄食在所县,民租多少,各有户数为限。”但没有对爵位在此之下者赐予土地的确证。

④ 《立命馆文学》79号。